

中华帝王将相

孟庆东 编著 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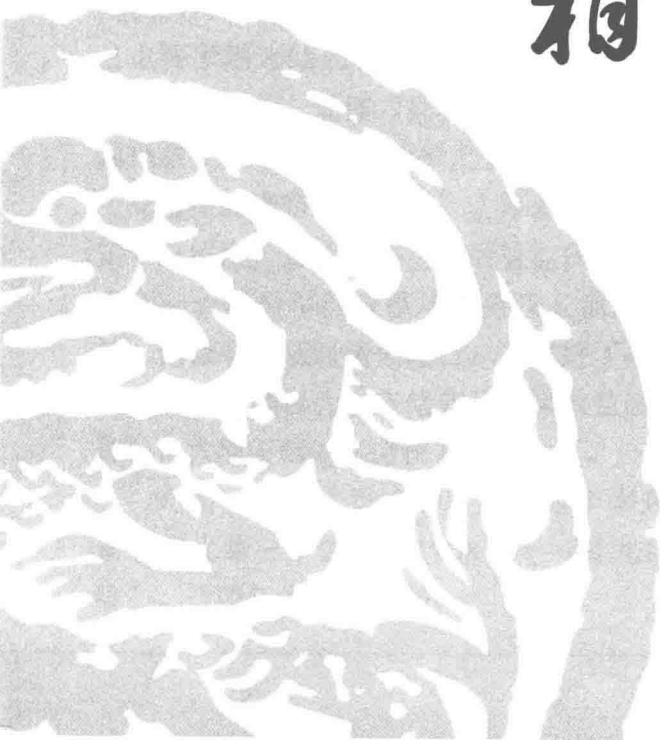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卷 孟庆东 编著



中华帝王将相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清宣统帝溥仪

一、生平综述

溥仪（1906～1967），清朝入关后第十代皇帝。醇亲王载沣之子，母苏完瓜尔佳氏。公元1908年即位，在位两年多，保留帝号15年。因其年号为宣统，故史称“宣统（帝）”。

二、重大事件

1. 三度登基 无异囚徒

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十四日，北京城里醇王府邸，一位新生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日，光绪帝病危，慈禧颁发了“醇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的懿旨，同时令将载沣年满三岁的长子溥仪送进皇宫教养。从而为大清王朝的皇统接续做好了安排。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日，光绪驾崩，慈禧面谕王公大臣：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大事，悉秉承之训示裁度施行……”这时慈禧并不认为自己也要紧随光绪而去，二十一日这天，她“终日料理大事，至晚乃获休息，虽极辛苦，而体力反较佳。翌日，仍于六点钟起召见军机与皇后、监国摄政王及其福晋即荣禄之女，谈话多时，以新帝之名下一谕，尊皇后（光绪皇后隆裕）为太后”。不意午饭时分突然晕倒，醒后感觉异常，自知末日已至，急诏隆裕皇太后暨监国摄政王等，谓：“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由摄政王随时请而施行。”作好了这样的安排之后，慈禧才放心地归天去了。她满以为有光绪亲兄弟摄政监国，有自己的亲侄女裁决“重大事件”，大清王朝的江山就万无一失了。

光绪、慈禧去世之后，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筹划，王公大臣们拟定新帝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九日举行“登基大典”，年号“宣统”，改明年为宣统元年。

宣统三年（1911）八月十九日，革命党人武昌首义成功，南方及西部数省闻风响应，辛亥革命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辛亥革命风暴的致命打击下，隆裕太后和王公大臣们为了保住大清皇帝称号和各自的身家性命，于穷途末路之中接受了袁世凯的《优待条例》。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了清帝溥仪的退位诏书。次日，袁世凯公开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出辞职。15日，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清王朝灭亡了，但宣统皇帝的称号保存下来了。此后，不但民国历任总统如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等，无论在私函亦或公文中，都赫然称溥仪为“大清皇帝陛下”，紫禁城外的遗老遗少、各地一些大小军阀政客以至像胡适那样著名的“新潮人物”，更是毕恭毕敬地尊称溥仪为“皇上”。

1917年，辫帅张勋复辟帝制，率数千辫子军扶溥仪“重登大宝”，不过，溥仪这次也仅仅当了12天“真正的皇帝”，便再次摔下了“宝座”，宣告复辟破产。

随着年龄的增长，溥仪对紫禁城以外的世界的好奇心越来越大，玩得也越来越新潮另类。为了锁住小皇帝的心，太妃及王公们决定尽早为溥仪完婚。经过多方协商并得到“皇帝恩准”，人选很快就确定下来。1922年12月1日，紫禁城中的“宣统皇帝”举行了隆重的大婚典礼。民国总统黎元洪派出了大批军警卫队保驾，并先以民国政府的名义送上贺礼万元，而后又和其他军阀、政客们以个人名义亲致祝贺，赠送厚礼。当时尽管共和已10年多了，可“大清皇帝”的名号在社会上还有相当声威和吸引力。溥仪作为“皇帝”，一次成婚，两个妻子：皇后，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的女儿，名婉容，字慕鸿，17岁；淑妃，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名文秀，14岁。

1924年11月5日，溥仪终于离开了那个他日夜想离开的紫禁城。但这既不是他自己计划的成功，也不是太妃和王公们让步的结果，而是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跟随吴佩孚进兵山海关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将小朝廷赶出了紫禁城。至此，溥仪结束了他15年的“大清皇帝”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要溥仪去东北建立以他为首的“新国家”。1931年11月10日夜，还是在日本军警特务的特别“保护”下，悄然离开日租界潜往东北。

1931年11月13日晨，溥仪在营口登陆。

稍后，日本人没有按约带他去沈阳，而是以确保“宣统帝安全”为理

由，将他秘密转移到旅顺，送进了一家日本人办的旅馆，不分昼夜地由日本军警“保护”起来，不得出居处半步。

三个月后，日本军政各界最终统一了认识，决定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暂行“共和制”：“国都”命名“新京”，设于长春；“国家元首”称“执政”，由溥仪出任。

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下，溥仪正式出任伪满洲国执政。

然而，溥仪三度登极称帝后，享有了日本人需要他享有的“尊荣”，同时也遭受了日本人给他带来的屈辱、痛苦和灾难，形同傀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仪的傀儡皇帝生涯宣告结束。16日，他在随关东军要人准备乘飞机逃往日本时做了苏联红军的俘虏。翌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犯，溥仪被押往苏联。

2. 接受改造 成为公民

溥仪被押往苏联后，先在赤塔一处疗养院住了两个月，而后便与相继押送到这里的其他伪满战犯一起，被转移到了离中国不远的伯力收容所，在这里度过了五年的拘留生活。

1950年7月，苏联政府将溥仪及其他伪满战犯全部移交给了中国政府。从此，溥仪开始了为时九年脱胎换骨的改造和自我改造生活。“皇帝”战犯的脱胎换骨与常人有所不同，溥仪在九年的改造与自我改造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比普通伪满战犯更为艰苦复杂的过程。

被引渡回国之初，溥仪只想到死。从在苏联听到回国的消息后，他就认为这次必死无疑，共产党决不会轻饶了他这个皇帝加头号战犯。

然而，自从他到了中国土地上后，溥仪所经历的一切都令他大惑不解：政府没有立即处死他，而是把他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同别的战犯一样，战犯管理所安排他洗了澡，换了衣服，发给了一些生活必需品，甚至还配给了香烟。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政府出兵援朝抗美，伪满战犯们几乎一致认为美国人会打进来，共产党会像历代王朝一样，在关键时候要先处理掉所有关押的重大犯人，结果是美国人没打进来，共产党更未把他们处理掉。

经过长达两三年之久的默默观察，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又回到抚顺时，溥仪已经意识到他不会被处死，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活下来了。“真龙天子”和常人原本也没有什么两样，溥仪从此开始考虑如何度过以后的时光。

死的问题解决了，对其他伪满战犯来说，已不再有过不去的关口，绝大部分人都不再怀疑共产党的政策，开始努力学习，积极改造，争取得到政府宽大处理。可是对“皇帝”战犯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溥仪前半生虽然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特别是伪满14年，无异任人摆布的木偶。但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却始终是按照皇帝标准，拿着皇帝的架子，即使是在苏联的五年间，也从不曾自己穿过衣服、叠过被子，甚至连脚都没自己洗过。成为战俘前，自然有人服侍，成了战俘后，他的弟弟溥杰、侄子小秀、小固、小瑞以至岳父荣源，都曾自觉自愿地以臣仆的身份为他端饭、铺床叠被，穿衣洗脚。在家族中，溥仪依然是“皇上”，所不同的只是这些人不再明着称他“皇上”，而是悄悄地叫他“上边”了。因此，当战犯管理所为了使溥仪获得改造，把他与家族成员分开，安排其他伪满战犯和他住在一起时，这位“皇帝”战犯便遇到了有生以来未曾遇到的“难题”：他不但要自己端饭、整理床铺、穿脱衣服、洗脚、洗衣服，而且还要和别人一样轮流做值日，打扫房间卫生，甚至还要提马桶！起初，溥仪觉得这是所方故意要他难看，因为这些事他从未做过，也不会做，以致早晨起床时，他还没穿好衣服，别人已经跑操去了，他未洗漱完，别人又开始吃饭了。每当溥仪感到自己无能、为自己事事落于人后而痛苦时，战犯管理所的同志就来帮助、开导他，同时也循循善诱地引导他认识过去，反复讲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鼓励他好好改造自己，争取做个新人。

自1955年起，战犯管理所一方面带着溥仪一行伪满战犯到东北各地参观工厂、矿山、农村、学校，请各方面的人诉说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的种种罪行，一面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允许战犯们的亲属写信和前来探望，促使他们认识自己的过去，看到光明的前途。溥仪同其他人一样，在这一过程中，他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成就，亲耳听见了那些伪满时期受尽非人折磨的人们，在诉说了他们这些过去的魔鬼的罪行后，又说出了希望他们能改造成一个正常人的动人心魄的话语。慢慢地，溥仪有了正常人的感情，开始认识自己的过去，并暗中盘算自己是否也能在什么时候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1957年，溥仪与七叔载涛的会见，终于燃起了他重新生活的希望之火。时年69岁的载涛，是溥仪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人。这位清末的“涛贝勒”、“军谕大臣”告诉十几年未见面的侄“皇上”：爱新觉罗家族的老人，新中国成立后都各尽所长，生活得很幸福；青年一代更是朝气蓬勃，

为建设新中国积极贡献力量，他这个“皇叔”已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多次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要他来看看“皇上”……从此以后，溥仪真的变了。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是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释放。

获释后，溥仪回到了阔别35年的北京。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他遍游了北京各名胜古迹，会见了爱新觉罗家族在京的所有成员，亲眼看到他们在新社会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他举行了家宴，详细询问了他的个人生活问题，并郑重地建议他重新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征求他的意见，对他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这一切都使溥仪增添了重新生活的无限勇气。

自1960年3月起，溥仪开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他先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半日学习，半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是熟悉新的生活环境。一年后，他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职，负责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但仍坚持每周到植物园去劳动一两天，工作闲暇，撰写自传《我的前半生》。在人民政府和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关心帮助下，1962年4月29日，溥仪与北京关厢医院的一名普通女护士李淑贤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婚后，56岁的溥仪对李淑贤温情脉脉，体贴入微，夫妻感情可谓如胶似漆，形影难分。年过半百，溥仪终于尝到了人间真正爱情生活的甜蜜和幸福。

为了表示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也为了使自己后半生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溥仪努力工作，勤奋学习，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在邻里之间、工作单位、国内各界名流以至国际上，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邻里之间，他正确对待自己和别人，和普通人一样自觉地打扫街道卫生，热情地为群众排忧解难，有时孩子般地把街道上的少年儿童成群结队地领到家里玩耍、游戏。在工作单位上，他学会了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及国家的关系，时时以一个普通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国家特发的几套制服除会见外宾及参加重要宴会外，平时总舍不得穿。结婚时，政府特批费用可以公款报销，可他体谅国家经济困难，仅为新娘买了一套衣裙。在国内各界名流中，溥仪影响颇大，特别是在他的一些“旧臣”中。这些人最初见到特赦

后的溥仪，总觉得还有那么一层说不出的关系，不少人仍旧表示跟他走。每当这种时候，溥仪总是坚定地说他跟共产党走，勉励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在美国看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感触极深，觉得一个封建皇帝和伪满战犯在新中国都能生活得很好，何况自己一个民国总统，从而坚定了回到大陆报效祖国的信心和决心。在国际上，溥仪特赦后短短几年时间会见了几百名国际友人、各国记者，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宽大胸怀，表示他对新中国前途的信心和为建设自己祖国尽力的决心。他的切身经历和感人话语，赢得了国际友人及各界人士的信任和赞誉。有的西方记者说，西方人理解溥仪比理解雷锋容易得多。溥仪以他特殊的身份，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特殊贡献。

正当溥仪沉浸在新生活的幸福和欢乐之中时，可怕的病魔悄悄向他袭来。其实，溥仪前半生长期的非正常人生早已糟蹋了他的身体。1962年新婚后不久，溥仪就不时溺血，经名医诊治，暂时抑制了病情的发展，加之新生活的愉快，冲淡了疾病折磨的痛苦，表面看上去，身体一直很健康。1964年底，溥仪病情开始恶化，尽管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特别保护下，专家为他进行特殊的精心治疗，使他减少了一些痛苦，也基本避开了随后刮起的“文化大革命”旋风的袭击，但肾癌这一恶魔终于在1967年10月17日凌晨吞噬了他的生命。

溥仪去世之时，正值“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后事极难处理。周恩来总理为此作出特别指示，说“溥仪遗体可以火化，也可以埋葬。根据家属意见，可以选择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和另一处墓地的任何一个地方安葬或寄存骨灰”。爱新觉罗家族主要成员在年过八旬的载涛的主持下，聚会讨论决定将溥仪遗体火化，骨灰寄存八宝山人民骨灰堂。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结束以后，新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会忘记每一个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的人，对末代皇帝溥仪特赦后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于1980年5月29日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溥仪的骨灰盒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安放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为中国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们的骨灰盒的第一室副舍。

三、历史功过

溥仪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他前半生虽为皇帝，却如同囚徒；后半生变为普通公民，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第二篇
历代名将

先秦名将

姜 尚

一、生平综述

姜尚，生卒年不详。吕氏，字子牙，或单呼牙，也称吕尚，东海海滨人。周灭商的策划者和军事指挥者。姜尚家世穷困，但是学识渊博，精于治国之道，通晓军事。他曾去商朝都城朝歌求官不成，年老之后，隐居在渭水之滨垂钓，70岁时遇到姬昌（即周文王），被封为“太师”（武官名），辅佐文王治理西周。周文王去世后，姜尚又辅佐周武王灭商，因有功封于齐，成为齐国的始祖。

二、重大事件

相传姜尚的先世是贵族，在舜时为官，因有功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古人有以封地或居住地为姓的习惯，所以姜尚也称为吕尚。姜尚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趁着贵族家庭的一点余温，姜尚少年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是他成年后已彻底沦为贫民。为维持生计，姜尚年轻时曾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宰牛卖肉，又到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卖酒。可惜，姜尚不谙生意经，做啥啥不成，以至于他的妻子实在无法忍受他的“窝囊”离他而去。不过，姜尚却不以为意，他的志向本不在经商，而在于治国兴邦。

姜尚所处的年代正值殷纣王执政。姜尚曾经在商朝做了一段时间官，后来发现纣王暴虐无道、荒淫无度，商朝政治腐朽至极，不可救药，于是辞官归隐了。

与商朝的腐败相反，西部的属国周国由于西伯姬昌倡行仁政，国势日强。姜尚得知姬昌为了治国兴邦，正在广求天下贤能之士，于是离开商朝，前往渭水河畔的周国领地。他本想直接前去求职，但又怕遭到拒绝，于是想卖关子以便引起周国重要官员的注意。经过精心设计，他决定在周文王打猎经常路过的磻溪边钓鱼，想以此引起周人的好奇。据说姜尚

钓鱼用直钩而且不挂鱼饵，同时嘴里还念叨：“不愿意活的鱼啊，上钩来吧。”俨然一派世外高人的形态。

一天，姬昌游猎路过此地，果然被姜尚的反常举动所吸引，于是上前搭讪，三言五语过后，姜尚为姬昌讲起天下大势和治国之道。姬昌也万万没有想到，在乡野之间竟有如此学问高深之人。于是，二人促膝倾心，纵论天下。一席倾谈，姬昌佩服姜尚的才学，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最后，姬昌说：“我先君太公预言当有圣人至周，周才得以兴盛，你就是那位圣人吧？我太公望子久矣！”姜尚遂得名“太公望”。姬昌亲自把姜尚扶上车辇，一起回宫，拜为太师，掌管军政大权。据说，姜尚当年已八十高龄。

不久，商纣王怀疑周文王谋反，把周文王拘捕在朝歌的监狱里。后来姜尚等人想方设法赎出了文王。文王归国之后，便与姜尚谋划推翻商朝。姜尚提出许多兵家谋略，由于这个原因，后人言及兵家权谋都首推姜尚，他便成了兵家的始祖。

姜尚在辅佐周文王期间，为强周灭商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内外政策：招贤才、积善德、兴武备、交邦国，很快地扩张了势力范围，使得“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周文王不及完成翦商大业就死了，武王姬发即位，拜姜尚为国师，尊称师尚父。姜尚继续辅佐周国朝政。

在辅佐周武王期间，姜尚主要组织指挥了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是孟津誓师；二是牧野之战。

周武王九年（前1064），周国想检验一下军队的威力，也想看一看各小国对周的拥护程度，同时也想试探一下商朝统治者的反应，于是周国大军在孟津召开了一场誓师大会，诸侯国不期而会于孟津者八百余。周武王在誓师大会上历数商纣王的罪行，发表了讨商檄文。孟津誓师，群情激奋，一致要求讨伐纣王、兴周灭商。但是姜太公知道当时周的力量还不足以一举消灭纣王，于是，劝说武王立即回师，继续扩军备战。

周武王十一年（前1062），周国进一步强盛，商朝则在纣王以及一班佞臣的祸害下已至崩溃边缘。姜尚认为灭商时机已经成熟，向武王进言：“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且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武王遵从尚父之言，决定兴兵伐纣。

这年二月，周武王率周国军队浩浩荡荡向朝歌进军，各诸侯国纷纷响应，拥者云集。周军一路所向披靡，最终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与纣王的十七万大军展开决战。作为三军主帅的姜太公不顾年迈，自任先锋，首

先率部冲入商军阵地。商朝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大部分是临时征调来的奴隶或犯人，他们不仅毫无斗志，而且痛恨纣王，所以，阵前倒戈，一触即溃。西周军队一路攻进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在鹿台投火自焚，至此，商朝灭亡，牧野之战胜利结束。

周武王在灭商后的次年病亡，其子姬诵即位，称周成王。管叔、蔡叔叛乱，姜尚又和周公旦一起辅佐周成王东征，消灭了武装叛乱势力，扫除了商朝贵族势力的残余，稳住了周朝的江山。

周朝建国之后开始分封，姜尚被封于齐，建都于营丘（今山东省淄博市北）。齐国建立之初，齐地人少、地狭，姜尚顺应当地的习俗，简化周朝的繁文缛节，大力发展商业，让百姓享受渔盐之利。于是天下人都聚集到齐国，齐国很快成为“冠带衣履天下”的东方大国，一直保持强国地位，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齐国都占有一席之地。

姜太公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还是中国神坛上一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作为宗教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为“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护佑神灵。

据传姜尚活了100多岁，但卒年和葬地不详。

三、历史功过

姜尚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军师型的军事家，其军事思想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用兵有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指出：“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由此看来，姜尚实为中国谋略家的开山鼻祖。

先 轸

一、生平综述

先轸（？～前627），春秋时期晋国上卿。因其采邑在原（今河南济源西北），又称原轸。先轸知兵善谋，颇有军事才干，是春秋时期晋文公和襄公的主将，晋文公确立霸业的军事支柱。他初为晋公子重耳的近臣。晋献公二十二年（前655），重耳被逼逃亡，先轸随行，流亡在外十九年。晋文公即位后，他便在晋国的政治、军事舞台上大显身手，屡升至中军元

帅，掌握国政。在崤之战后，因晋襄公误听妇人之言放走孟明视等三位秦将，先轸出于忠愤而啮了晋襄公一口，晋襄公并未责怪先轸，然先轸却非常不安，为表明心志，晋襄公元年（前627），在对狄人的战争中，脱去铠甲，战死沙场。

二、重大事件

在史书中，先轸早期的生活没有太多记载，只知他是公子重耳的近臣。重耳是晋献公的第二个儿子，贤明豁达，有经世治国之才，因此，他身边聚集了一批贤能之士。先轸进入这群人中，说明他志向有远见。晋献公晚年昏庸，他听信谗言，欲杀死重耳。重耳被迫出逃，过起了流亡的生活。在随从重耳出亡的人中就有先轸。

重耳虽有才学，但当时的环境对他非常不利。他是次子，按世袭制，长子即位，没他做国君的份儿。他又是戎族人（狐姬）所生，这就更降低了他的身份，不仅晋献公晚年要杀他，晋献公死后，继任者也不放过他。因此，重耳流亡他乡几遭追杀，颠沛流离。在这种条件下，先轸能够舍死追随流亡公子重耳，一方面说明他忠信，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眼界开阔，追求明君。

重耳在外过了十九年的流亡生活，后来晋国发生叛乱，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乘乱夺取了君位，是为晋文公。此后先轸便开始在晋国的政治、军事舞台上大显身手。

在先轸之前的战争，包括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战争双方都讲究“以战为礼”，是用一种类似“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现代体育比赛风格去打仗的。先轸开创了谋略战争的先河，他的这种作战风格在晋国吞并卫国时就有显露。晋国吞并卫国是城濮之战的前奏。

春秋初期，地处江汉之间的楚国和地处山西西南部的晋国都是强国，两国都意图称霸中原，并积极向中原小国扩张。周襄王十九年（前633），楚国联合陈、蔡、郑、许四国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先轸认为应该去救宋国，因为宋国曾在晋文公重耳患难时给予厚待，理应报答。楚国虽然也对晋文公有恩，但当前只有打败楚国，才能建立霸业，所以绝对不能放弃这个机会。晋文公同意先轸的意见，决定发兵救宋。

为了增强实力，楚国在攻打宋国时还联合了许多小国。当时卫国和曹国刚刚叛晋投楚，为了给这次出兵找到充分的理由，晋国人决定拿卫国和曹国开刀，迫使楚国救援，这样不用和楚军交战即可解宋国之围。

晋文公五年（前632）春，晋文公以郤穀为中军主将、先轾为副将，亲率大军出兵攻打曹、卫。晋军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即假意以伐曹为名，借道于卫。由于卫曹两国刚刚建立和睦关系，卫国必然不同意借道，这样晋军就可以出其不意攻下卫国，再挥师曹国。果然，当晋国向卫国请求借道伐曹时遭到拒绝，于是晋文公命令部队向南迂回渡过了黄河，然后派先轾等将领率军进攻卫国的重镇五鹿城。

在出发前，先轾命军士多带旗帜，经过山林高岭之时，便让士卒们大张旗帜，故意让敌军看见。五鹿城中的守军连同百姓但见旌旗布满山林，以为有许多兵将，于是争相逃窜。当先轾的部队到达时，五鹿城几乎成了空城。卫成公闻知五鹿城陷落，不得不逃出卫国。晋军一举占领卫国全部国土，紧接着灭了曹国，俘虏了曹共公，逼临宋境。

晋军攻下五鹿城不久，郤穀病故，先轾以他的品德和韬略被破格提拔为三军统帅。

晋文公虽然攻占了曹、卫两国，但楚军并未因此而移师攻晋，仍然强攻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商丘南），宋国又向晋国告急。晋文公对当时的局面很感为难：通过外交途径呼吁楚国罢兵撤围，楚国肯定不会理睬；不救宋国时为他想出一个解决办法：把曹、卫两国的土地分一部分给宋国，让宋国去买通齐国和秦国，请求齐、秦两国出面向楚国说情，为宋国解围。楚国是曹、卫的靠山，对分割曹、卫两国的土地一定无法接受，必定不会答应齐、秦两国的说情。齐、秦两国既得了宋国的贿赂，而楚国又不给他们面子，那时必定会与晋国联合，共同对楚作战。晋文公采纳了这个计谋，把齐、秦两国放到了楚国的对立面。楚成王见不能取胜，只好引军回国。

楚成王撤军，楚国令尹子玉却不肯撤军，坚持要求楚王允许他同晋军作战。于是楚王给他留了少量军队，自己回国了。

子玉以善战闻名于诸侯，但骄傲自负，他带着为数不多的兵力继续围困宋国，并派使者告诉晋文公，如果晋国恢复曹、卫两国的国土，归还两国的政权，楚军就撤出宋国。子玉这一招很厉害，先轾称之为“一言而定三国”，如果晋国不答应，就把曹、卫、楚三国都得罪了。如果答应，那晋国不但白忙了，而且威信尽失。这时，先轾提出激敌之计，迫使子玉主动开战：首先把楚国使者囚禁起来，然后私下向曹、卫两国允诺恢复其国，条件是它们与楚国断交。曹、卫得到这样的承诺，马上断绝了与楚国的同盟关系。楚军主帅子玉大怒，撤去宋围，直逼晋军，拉开了著名的城

濮之战的帷幕。

晋文公流亡楚国时楚成王对他有过厚待之恩。当时楚成王问他，如果他回国执政将用什么报答自己，重耳回答，两国交兵，“退避三舍”。此时晋文公不忘旧日许诺，下令“退避三舍”，一直退到卫国的城濮（今山东范县临濮集一带）才扎下营寨，等待楚军来攻。古时一舍为三十里，三舍就是九十里。“退避三舍”既是信守诺言，又可占据有利地形，将敌人诱入口袋阵。

晋文公五年（前632），齐、秦、宋三国的助战军队与晋前军会合于城濮，子玉也率楚国大军进入城濮。交战之时，先轸命令下军进攻楚军较弱的右军。晋军下军给驾车的马统统蒙上虎皮，向前横冲直撞，楚右军驾车的马视对方如虎，被吓得迈不动脚步，全部俯卧于地，兵士惊慌不知所措。晋军下军径直冲入楚右军阵地，楚右军全军崩溃。

与此同时，晋右翼上军主将狐偃竖起两面大旗伪装主将后退，引诱楚左军出击。下军主将栾枝也在阵后用车拖曳树枝，扬起尘土，假装后面军队也在撤退，以引诱楚军。楚左军不知是计，放胆追杀，把侧翼暴露给晋军。先轸见时机已到，便指挥中军拦腰斩断楚军，狐毛、狐偃率领的上军也冲过来，下军在击败楚右军之后，回头包围了楚上军。楚军主将子西率领的部队被晋军团团围住。主帅子玉奋力解救，才保住楚军主力的突围。楚军大败而去，城濮之战至此结束。城濮之战后，晋国称霸诸侯，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晋军于城濮之战大胜楚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谋略战，在此战中，马背上蒙虎皮、用马车拖树枝制造扬尘等现在看来很简单的计谋，在那个“礼兵”的时代是惊天动地的创举。从此，军队与仪仗队有了区别。兵不厌诈，也开创了兵法的先河，为之后的孙武、吴起创造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崤之战是先轸指挥的第二个著名战役。

在晋国逐渐强盛起来并终于取代齐国而成为中原霸主的时期，西部邻国秦国也日渐强盛。先轸始终认为秦国是晋国的威胁，但因晋文公感恩于秦穆公，两国一直没有交兵。

周襄王二十四年（前628）冬，晋文公去世，晋襄公即位。晋文公未发丧就发生了秦国出兵攻打郑国未成而一举灭掉归附于晋国的滑国之事件。先轸认为这是上天给予晋国的机会，建议晋襄公截击秦国军队。栾枝提出晋国无故进攻秦的军队是忘本（秦穆公曾救助过晋文公）。先轸则认为，秦国这次出师，国内许多有识之士不同意，不得人心；秦国这次行动，并

未征求霸主晋国的意见，这是欺晋文公逝世不久，晋国无人；何况郑国与晋国是同姓，在道义上应该站在一起；再说“一日纵敌，数世之患”，进攻秦军是为子孙后代打算，不能说是忘本。

由于先轸的坚持，晋襄公下令截击秦军。先轸奉命整军出战，并请求晋襄公带孝出征。先轸算定秦国远征军回师的时间，率军在崤（今河南陕县东南）的隘道设伏。晋文公九年（前628）四月，秦国军队如期而返。秦军进入崤山险路，秦主将孟明视已经察觉到地势危险，于是，他催促秦军加速前进。可惜晚了，当秦军进入晋军伏击区后，先轸一声令下，堵住秦军退路，伏兵从两侧树丛中杀出。经过激战，秦军全军覆灭，孟明视等三位大将被俘。晋军以极小的代价换取了消灭秦军数百辆兵车和数万士兵的巨大胜利。这就是著名的崤之战。

在处理这三员秦将的问题上，先轸与晋襄公发生了争执。原来，晋襄公的母亲是秦穆公的女儿，出于私心，她对襄公说，秦穆公对战败很恼火，定要杀那三员秦将。如把他们放回去，满足了秦穆公的愿望，两国不会结怨过深。襄公听信了她的话，放了三员秦将。先轸听说后非常气愤，发怒说：

“武将花了很大力气才在战场上擒获他们，妇人说几句谎话就把他们赦免。毁伤战果而长敌人的志气，晋国要不了多久就会灭亡的！”他越说越气愤，竟至啐了晋襄公一口，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襄公这才醒悟过来，急忙派人追赶三员秦将，但是为时已晚。结果不出先轸所料，三年后秦军仍由孟明视等三将率军两次攻晋，大败晋军，报了崤山之仇。这时，先轸已不在人世。

回头再说先轸怒啐晋襄公后，深知有罪，他请求晋襄公处罚他，但晋襄公原谅了他。先轸深感不安。

晋襄公元年（前627），北方的狄国向晋国边界发起进攻。先轸主动提出愿上战场以死效君赎罪，但提出辞去元帅之职。他说，无礼之人，不足为帅，请君另择良帅。襄公不准，仍命他为帅。先轸率军迎敌，在箕城与狄族相遇。经过激战，晋军消灭了狄军主力，杀死了狄兵首领，狄兵只剩下些许残余势力。在晋军即将大获全胜之时，先轸却卸掉头盔甲冑，单车冲入狄军，战死在沙场。将士们都明白，他是自责其唾君之罪，假狄人之手以代君愆而已。

三、历史功过

先轸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既有元帅职衔，又有元帅实绩的军事